



江泽民专题思想
研究专著系列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
庆祝建党90周年重点出版物

江泽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思想研究

袁恩桢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江泽民专题思想
研究专著系列

江泽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思想研究

袁恩桢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江泽民专题思想研究专著系列》之一,以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为研究对象,全面评述了江泽民相关的重要决策活动,深入解读了江泽民相关的重要讲话和报告,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石”和“五个支柱”展开论述,系统分析了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成果和主要贡献,对于当今经济领域的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泽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研究 / 袁恩桢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江泽民专题思想研究专著系列)

ISBN 978 - 7 - 313 - 07736 - 3

I. ①江… II. ①袁… III. ①江泽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理论—研究 IV. ①D2 - 0②F04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343 号

江泽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研究

袁恩桢 著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1 字数: 136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13 - 07736 - 3/D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71 - 85775153

导 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起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旗帜。

从提出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到进一步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先后经历了十余年的探索时间。

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与发展之路的奠基者是邓小平,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

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主线,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启自邓小平,成在江泽民。

以市场导向的改革来破除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石破天惊的巨大变革,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一直是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标志,而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来对待。

这场变革已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基础理论,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资本论》中,一开始就是把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进行分析的。正是从商品内含的诸多矛盾,即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分析中,逐步揭示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揭示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并进一步引申出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即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如今,我们的改革一方面要抛弃传统理论中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一大支柱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又要把商品、货币与市场这些原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细胞的东西引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对于长期浸润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们,不能不是晴天霹雳。从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要化为全党与全社会的共识,必然会有一个过程。社会认识上的这个变化,可以从计划与市场关系提法的演变,从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认识变化中看出: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必须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①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有关文件中,提法一直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但还不提商品经济概念。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②文件开始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有商品经济概念,但仍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摘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一“本质”含义。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仍强调必须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

1988年,面对当时出现的以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双膨胀为特点的经济失控,与1989~1991年间的治理整顿,此时中央的提法稍有变化:“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表述方式尽管有所不同,但从不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商品经济存在,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但问题是社会的一般认识仍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能植入社会主义社会之中。

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论断。^①

正是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江泽民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②

自1978年底到1992年的十余年时间中,整个社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经历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相应地在市场经济理论认识上,也经历了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个阶段:先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但不承认商品经济;再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经济,但不承认市场经济;最后是承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存在,认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江泽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最大贡献。

长期以来,有关中国改革的市场导向问题,国内外始终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议论。特别是在改革初期,不仅国内有些人士把市场导向视作资本主义导向,而且也有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最后必然会走到他们那里。市场导向、市场经济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其中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用的论述,高屋建瓴地消弭了这场争论,取得了社会的共识。

商品、市场与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方法,一种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用的手段,但也不能不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且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这里所说的经济关系,当然不是指姓资、姓社的经济关系,而是一种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交换活动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其初级阶段,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形态,在这里不仅存在多种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而且连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也不是处在纯粹的状态。在全民所有制或者说国有经济内部,事实上存在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这决定了在国有企业之间,再不能像传统体制那样实行无偿调拨,而必须实行等价交换。从而,商品、货币与市场关系是内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内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之中。

商品、市场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方法,或者说一种经济关系,是以承认个人与局部利益为媒介,用以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速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序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可能产生忽视社会利

益与国家利益,出现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外部不经济现象,即市场经济固有的一些消极影响。

正是基于对市场经济作用两重性的这个认识,所以江泽民认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一般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性质。”西方市场经济中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①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最亮丽的一笔,由此而开拓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作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开始主持中央工作,那正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时刻:一方面是西方国家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为借口,对中国采取从经济到政治上的封锁围堵;另一方面是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相继崩溃,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历史的低潮。为了拨开这时代的阴霾,邓小平以非凡的政治家气魄,下了开放浦东与南方谈话两枚棋子,向世人展示了继续高举改革与开放大旗的魄力与勇气。

也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江泽民明确指出,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当前是处于低潮,但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崩溃”。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有350年的历史,尚且有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经历,年轻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困难与弯路,也难以完全避免。他还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并

①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没有解决当代世界的很多根本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决这些矛盾。^①

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信念,高瞻远瞩的政治敏感性,是中国领导人的共有特点。面对国内外的重重压力,只能靠加大改革与开放的力度去逐渐化解。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无疑是既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又把握住改革的社会主义航向的重要罗盘。

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就是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问题。早在1991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就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②这里讲的根本界限,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界限,即我们要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

江泽民坚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导下,“社会主义应当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也应当实现资本主义难以达到的社会公正”^③。

“只要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实力,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一定能取得胜利。”^④

全国上下,当前都朝着这一伟大的目标奋力前进!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136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③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001
第一节 计划与市场关系探索的科学升华	001
第二节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史无前例的 伟大创造	008
第三节 一系列改革都环绕此目标模式而展开	012
第四节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 长期过程	015
 第二章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018
第一节 市场经济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018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特有的经济范畴	021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所大学校	026
 第三章 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030
第一节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031
第二节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	036
第三节 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040
第四节 在两个“坚定不移”中协调公与非公经济的相互关系	042

第四章 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045
第一节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	045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049
第三节 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	055
第五章 强化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作用	057
第一节 市场是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	057
第二节 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与发展	060
第三节 正确协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关系	068
第六章 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071
第一节 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	071
第二节 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巨大优势	075
第三节 努力提高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水平	078
第四节 宏观调控与政府职能转变	080
第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	084
第一节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	084
第二节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087
第三节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历史意义	091
第四节 坚持先富与共富的辩证统一	094
第八章 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	098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社会保障体系支持	098
第二节 再就业工程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01
第三节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105

第九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发展	107
第一节 正确处理东中西部经济关系	107
第二节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宏伟的世纪工程	113
第三节 东部要继续加快发展并率先实现现代化	118
第十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121
第一节 从非均衡发展到可持续发展	121
第二节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	125
第三节 发展的核心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129
第十一章 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应有之义	132
第一节 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132
第二节 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138
第三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141
第四节 大力提倡“走出去”	144
第十二章 牢牢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148
第一节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148
第二节 要防止拜金主义的影响	150
第三节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156
参考文献	159
后记	161

第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 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创新,更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项伟大创新。在这项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启动了改革的航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完善了改革的目标。

第一节 计划与市场关系探索的科学升华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与市场关系探索开始的。这正如江泽民所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

划与市场的关系。”^①

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一边倒”的形势下,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果。

一个饱经战争摧残、贫穷落后的中国,尽管已取得了三年经济恢复的出色成绩,但是要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赶超之路,能集全国之力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失为一个办法。事实也是这样。正是依靠了计划经济体制,才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迅速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解决旧中国长期遗存的失业问题,并标志了这头“东方睡狮”开始苏醒。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肯定。^②

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体制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不合理性:原以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特点与优点是能做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危机的发生,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大跃进”、“以钢为纲”、“人民公社”等这些指令性因素,不断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比例失调与经济混乱,严重伤害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效益,其危害程度绝不亚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场经济危机;计划经济体制使众多企业成了毫无自主权的车间,束缚了广大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导致微观经济效益的极度低下;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连的“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更压抑了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自 1958 年以后,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显示出它不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弊端,特别是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距离再一次拉开。

应该说,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困境的探索,首先不是在中国,而是从苏联、

①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5 页。

②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3 页。

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的。

1962年9月,在苏联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作者是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文中主张以利润作为联结国家与企业间计划任务的形式:计划完成得越好,企业的利润越多;企业赢利率越高,职工的奖金越多。这篇被后人称为“利别尔曼建议”的文章,其中心意思是强调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无论是国家计划、企业生产还是劳动者的激励,都必须充分利用价值规律与市场关系。尽管“建议”还是立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引入商品与价值关系,认为价值规律是完成国家计划的纽带与工具,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对传统经济体制有巨大的冲击力。此文获时任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赏识与支持,不仅迅速在《消息报》、《经济报》等全苏各主要报刊予以转载,而且由此展开了全苏范围的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波及全苏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部门。苏联政府还特地组织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政府经济计划机构、《真理报》等部门,成立一个研究和总结这场讨论的专门委员会,并写出了一份总结讨论情况和有关实施改革建议的综合报告。利别尔曼建议,可以说是拉开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序幕。

1966年在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领导下,苏联进一步开展以放松计划控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为内容的改革。^①

匈牙利在1968年也仿效苏联改革的有关内容,启动“新经济机制”的改革,为后来比较顺利地过渡到市场经济准备了条件。波兰在1967年进行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的改革,1973年开展了以“高速发展战略”为先导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市场化改革比匈牙利更彻底,后在苏

①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3页。

联的武力干预下夭折。匈牙利、民主德国在这段时期都进行了一些以市场为导向的、各有特点的改革。

而当年的中国,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批资反修”的年代,并把利别尔曼文章当作修正主义大毒草来批。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一个巨大反差:在中国,是狂热地展开“批资反修”,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却是热火朝天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应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以在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也是以苏联、东欧国家为师,虚心学习与借鉴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诸多经验:先是学习苏联的改革经验;继而学习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工人自治与农工商联合体等经验;再是学习匈牙利与民主德国等国的改革经验。

在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包括其经济学家的一些理论,特别受到我们的关注。波兰的兰格、布鲁斯,匈牙利的科尔奈等学者的观点在我国成了热门话题。

1979年末,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主持经济改革的副总理奥塔·锡克来华讲学,被认为是在中国刮起了一阵研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旋风。

198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也就是名动一时的游弋于长江上的“巴山轮”会议。会议议题为宏观经济管理,实是聚焦于改革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出席会议的外方专家,除了匈牙利的科尔奈、波兰的布鲁斯、南斯拉夫的巴伊特等学者,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的托宾,以及其他关注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中方与会的有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吴敬琏等专家。

众多学者的发言与观点在会上的碰撞,大大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但是也使我们明白了基本的一点,即要让国外学者为中国改革开出可行的药方,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终究没有经历中国的实践,而且是极其复杂的实践。当然,借鉴外国的改革经验,汲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精华,对推进我国经济改革也是极其重要的。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改革中的苏联、东欧诸国,却似多米诺骨牌一样,发生了社会主义体制的相继崩溃,尽管这里有政治等原因,但从根本上说,却与经济改革之路没有走通,特别是没有处理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或者说没有处理好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有关。

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可以向一些先行者学习,但最终还得靠中国自己的探索与实践。

在春暖花开的 1979 年 4 月,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后不久,中国经济学家集会无锡,召开了一次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会议的议题尽管广泛,但核心是讨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特别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会上传来了 4 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副总理的有关发言:“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①学者们对这个观点并不陌生,这本是陈云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上的发言精神,但却一直被时代所忽视。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标志着在商品、货币与价值规律问题上的解禁。于是,计划与市场关系,计划与市场双重调节,就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关注点。其实,许多学者为会议所提供的论文中,都已提到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或者说计划与市场双重调节的问题,只是听到了中央会议上的同样声音使他们更为兴奋。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摘编》,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 页。